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上海通志馆 编

中国新方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金光耀 金大陆 主编

1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上海通志馆编;金光耀,金大陆主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458-0947-3

I. ①中… II. ①上… ②上… ③金… ④金… III. 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史料-中国 IV. ①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7950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邹 烨
特约编辑 郑英旻
编 辑 孙 莺 田芳园
装帧设计 酆书径
技术编辑 吴 放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上海通志馆 编

金光耀 金大陆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25.25 字数 6,800,000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947-3/D·32

定价 2000.00 元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项目



2014年10月8日志愿者合影



2011年11月22日在上海通志馆前志愿者合影



2011年11月22日在上海通志馆举行志愿者会议



2012年10月13日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进行编纂工作

序

沈国明

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支持下,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完成了6卷本《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以下简称“史料辑录”)。这是一项较有规模的课题,在研究会精心组织下,上海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知青史研究和“文革”史研究的学者齐心协力,夙兴夜寐,带领他们的助手、学生,历时三年多,遍走各地档案馆、方志馆,翻阅大量方志,搜寻资料,经过分类爬梳,精心编辑,形成了这套约5000页的大型史料书。

方志对知青史与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十分重要性不言而喻。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全国,知青遍布各地,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描绘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的全景是件困难的事,需要具备多种条件,在所有条件中,必须拥有翔实可靠的资料应当是最基础的条件。方志中一般都会记载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在当地的基本情况,这些资料汇集在一起,大致能拼成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的概况。目前,全国方志汗牛充栋,将每一部方志中关于知青与上山下乡的内容抽出汇编成册,工作量可想而知,事实上,这是一项再创作,等于编辑出版了一部关于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的专题方志,让查找相关资料的事情一下子变得便捷了。

上山下乡已经终结三十多年,时至今日,知青已经陆续退休。赋闲的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回忆、品味和研究人生,知青文化活动方兴未艾,各种知青回忆录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令人目不暇接。回忆录基本上叙述的都是个人经历,众多作者从身边人、身边事感性地发表对上山下乡的看法,这些著述为研究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史提供了大量鲜活史料,但是,较少涉及各地知青与上山下乡总体情况以及具体政策,而且,对事实的描述常常因为记忆不准确,或者存在某些忌讳而失真。相比之下,方志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高得多。因此,仅凭知青回忆录描绘不出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史全貌,必须充分利用方志和其他档案资料才行。早些年,曾在原国务院知青办长期从事知青工作的老同志,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在当时劳动部的组织下,编撰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两部纪实性的史书,记述了从1955年至1981年这27年中涉及上山下乡和知青的大事、要事,理出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脉络。但是,这类出版物太少,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如今,史料辑录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憾。这套书是近年抓紧进行史料收集和整理的具体成果,也是关于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学术研究逐步趋于规范,并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反映,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工作深入提供了基础。

史料辑录收集了全国各省市方志中与知青、上山下乡有关的记载,基本实现了课题立项

时确定的“穷尽所有方志”的要求。所谓“穷尽”，就是将方志中关于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的记载“一网打尽”，地域上要做到“全覆盖”、时间上要贯穿“全过程”。课题组曾经担心各地是否都有关于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完备记录，也担心经历这么多年，相关档案是否安在，因为这些都关系到本套史料辑录的权威性。其实，所谓权威性是相对的概念，记录完备、保存完好的资料具有权威性，记录不甚完备但收集齐全的资料也具有权威性。面对参差不齐的众多方志，课题组仔细搜寻，工作做得很细致，基本实现了初衷。在今后出版的方志中，关于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内容也许还会有增加，但是，随着知青整体性地跨入老年，以及上山下乡运动日益远去，可以预见，新增的内容应该相当有限，这决定了本套史料辑录的权威性。

知青史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起步不久，它是历史研究的富矿。从现状看，史料收集编撰方面有很多可以开垦的处女地。档案、方志、回忆录、口述史的收集整理才刚刚开了个头，是很初步的，还有大量宝贵资料亟待开发整理研究，这项工作需要抓紧进行。知青尚处于老龄中的年轻段，这是口述史料搜集的有利条件。口述史的当事人所说的人生经历，其实也具有对宏观历史加以阐释的意义，不可小视。总之，各种史料都不是无足轻重的。

知青史与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能否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仅取决于史料丰富可靠与否，还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和理论指导以及研究方法。研究人员应当运用唯物史观，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客观史料出发，而不能从固有的结论出发，或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史料运用上实事求是，不随意剪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不美化、丑化，也不夸大、掩盖或缩小，尽可能还原到当时的时空条件下，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应取的科学态度。

研究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需要探究过去，也需要关注国家的现在和未来，因为那段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紧密相连的。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知青都认同他们与共和国同命运，正因为如此，对上山下乡运动应当从国家发展甚至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加以剖析，进而形成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在这样的目标引领下，我们会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至今所进行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至多只是拂去了些许覆盖在历史印迹上的浮尘，对离去三十年的历史投上回眸的一瞥，距离掌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还相差很远，我们根本没有底气说已经了解了事实的全部总和，更没有资格说已经可以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发现历史的本质。

由此看来，知青史和上山下乡运动研究任重道远。希望在史料辑录这项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不断推出更多优秀成果，并在这过程中，培养出更多年轻的研究人员！

2014年6月12日

前言^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20世纪50年代中发端,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兴起高潮,形成遍及全国城乡的大规模运动,并延续至70年代后期,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对这一段牵涉到数千万人之多的历史的书写还在上山下乡进行之时就已开始了,但大规模的书写是在“文革”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终止时出现的。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写首先是从文学肇始的。“文革”前出版的小说《军队的女儿》和《边疆晓歌》是对知识青年参加边疆建设的最早书写,并且感召了整整一代知识青年。“文革”一结束有知青经历的作家写作的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形成了当代文学中独特的“知青文学”。“知青文学”不仅是新时期文学的报春鸟,也是描述上山下乡运动的开路先锋,可以被看作是对上山下乡运动最初的历史书写。

知青文学的第一个特征是与同时代的“伤痕文学”一致的,即紧扣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将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经受的苦难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极左路线。在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等文学作品中,知识青年在农村的遭遇都与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父母具有的反革命、走资派和叛徒的身份成了这些知青遭受苦难的根源,而所谓的反革命、走资派和叛徒到最后都是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诬陷所致。因此这些小说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和控诉色彩,宣泄了知青心中的悲愤之情,它们书写的是一代知青满身伤痕、历经苦难的蹉跎岁月。

文学描写知青时代的第二个特征是阐发充满青春气息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以及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所具有的悲壮性。完美表现这一书写特征的是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它展现了一代青年昂扬的英雄主义气概,也刻画出知青群体的复杂性。作者通过老政委的嘴说道:“我相信,今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当社会评论到你们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青年时,会说到这样一句话:‘他们曾在北大荒生活过!’”这不只是梁晓声,而是相当大一部分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和评价。

上述两个特征也就是文学对知青历史书写的两大主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青作家都遵循这种泾渭分明的书写,如老鬼的《血色黄昏》、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和邓贤的《中国

^① 本书采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绝大多数来自上海通志馆馆藏新方志,因此本书最初定名为《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通志馆藏)》,但为了尽最大可能不遗漏已出版的新方志中有关史料,而后又在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补充了上海通志馆馆藏缺漏的一部分新方志的有关史料,故改为现名。

知青梦》等纪实性文学作品,它们以平实粗犷的笔调直书自己的历史。

文学对知青历史的书写在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社会条件许可下展现了上山下乡运动,这是知青文学的贡献。纪实性知青文学作品的出现也表明,知青作家已不满足于仅仅用情感抒发、人物塑造、心理描写等文学擅长的手段来书写知青时代,而在追求更直接的方式直面这一段厚重的历史,而这一使命由史学来承担显然更为合适。

于是,当知青文学的高潮过去后,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史学书写开始了。史学不如文学那样迅捷,关于知青研究的第一篇史学论文要到1987年才出现,即张化撰写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90年代开始,关于知青研究的史学论文逐渐增多,并且随之出现通史性的著作,在“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前后以刘小萌等合编的《中国知青事典》、史卫民、何岚的《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 1953—1968》、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8—1980》和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与《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的相继出版为标志,形成了对知青时代史学书写的一个高潮。

通观这一时期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史学论文与著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史学书写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置于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文革”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探讨上山下乡政策的产生与动因,以及这一政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联。许多学者指出上山下乡政策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对于“文革”初期中学生无法正常升学和就业与上山下乡政策之间存在着如何程度的关联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读。^①

对上山下乡运动史学书写的第二个层面是梳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进程。这主要是上述几本知青史著作以及也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其他几本知青史著作所作出的贡献。这些著作中尤以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 1953—1968》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6—1980年》最为突出,两部著作合起来完整、全面地叙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波澜初兴到大潮涌起再到戛然而止的整个历史进程。顾洪章主编的两部著作是依据国务院知青办档案资料编写而成的,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些著作开启了立足历史资料书写知青上山下乡的史学之路。

对上山下乡运动史学书写的第三个层面是从微观上展现和讨论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产劳动、恋爱婚姻、文化生活、医疗疾病等各方面的状况。知青文学关注的“血统论”问题同样引起史学的关注,史学作品中那些看似冰冷的数据对“血统论”的批判更为直接。如1973年在贵州18个县的上海知青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占到19.9%,其中台江县甚至高达43%,几近半数的知青家庭出身有问题,当然也因此受到各种各样特别的“关照”。^②

^① 姜义华:《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载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369页。

^② 刘小萌:《“血统论”重压下的下乡知青》,载同上,第119页。

与此相同的是对知青的婚姻、病退问题的研究,对相关的政策、知青婚姻率、婚姻类型、病退中存在的问题等有细致而具体的探究。^①而从事艺术史的学者则研究了包括美术和歌曲在内的知青文艺,展现了知青历史的丰富性。^②在一些具体问题如知青婚姻上,历史学之外的社会学研究者也介入进来,虽然在研究的方法上与史学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也可看作是对知青时代的史学书写。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对知青时代的史学书写主要是由有知青经历的历史学者完成的,这与文学书写由知青作家完成是相同的。作为知青史的研究者,这些学者的优势是明显的,也是独特的。他们对知青生活有亲身的经历,对那个时代有切身的感受,又接受了正规的史学训练,因此在阅读各种各样的史料时不仅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其主旨,而且还能更敏锐地察觉到字里行间或者说文字背后所隐藏的信息,从而也就能更贴近事实地将历史书写出来。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上山下乡涉及近2000万知识青年,整整一代青年在农村度过了生命中最难忘的青春时期。这些知青离开农村后都有倾诉的冲动和留下青春记忆的愿望,因此他们回城后以各种形式发表了难以计数的回忆文字。这些回忆文字也是一种历史书写。相比较带有专业色彩的文学和史学书写,可称之为对知青历史的民间书写。

对知青历史的民间书写可以1990年出版的北大荒知青的集体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为开端。在这之后,知青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似乎成为一种时尚,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势不可挡,至1998年“文革”中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形成一个高潮,与同时出现的史学书写高潮交相辉映。这些回忆录的作者们是散在各个领域的老知青,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就编写方式和内容而言,这些回忆录有以下乡地区为主体的,如《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回首黄土地》等,有以不同的知青群体为主体的,如《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的回忆录》、《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青春方程式》(女知青)等。与文学书写和史学书写不同的是,民间书写在经历了高潮后并没有退潮。进入21世纪后,由于网络的兴起,出现了众多的知青网站以及知青自己办的刊物,刊登大量知青的回忆文字,对知青历史的民间书写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在延续。从传统的纸本到网络,发表的门槛大大降低,又由于许多知青退休后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因此更多的普通人参与进来。

民间书写的内容包容万象,涉及知青时代的方方面面,但其主题离不开文学书写的两大主题,即倾诉苦难与讴歌青春。就第一个主题而言,这些回忆录记叙了知青在农村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在林林总总的回忆录中,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尤其值得一提。这是一批“文革”前因出身不好被剥夺升学资格而被强迫下乡的老知青,他们所回忆的苦难人生是对“血统论”的有力批判。但总体而言,知青回忆录的叙述更多地偏向于第二个主题。四川省

^① 史卫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病退”、“困退”问题》;刘小萌:《下乡知识青年婚姻问题剖析》,载同上,第144—149、164—187页。

^② 如杨健:《历史勾勒:内蒙古与东北的知青文艺》;戴嘉枋:《乌托邦里的哀歌:“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王洪义:《知青美术源流述略》,载同上,第204—208、275—304、558—577页。

知青 1991 年在成都举办赴云南二十年回顾展时亮出的口号“青春无悔”表达了许多知青的情感,定下了他们回忆的基调。究其原因,首先,回忆录的撰写者虽不是知青作家那样的知青精英,但大多数还是后知青时代中的“成功者”,他们有能力更有意愿去回首往事,并且因为个人的经历往往会将昔日的苦难转换成今日成功的必要铺垫,在两者间建立起明确的因果关系。一位后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知青就这样说道:“在我们今天的成功中,都能看到当年兵团生活的痕迹。”^①其次,随着已经或即将步入晚年,老知青更愿意追忆已经逝去的青春,这是一种老人的情感和寄托,这之中也包含着他们对当今日益商品化时代的困惑和不满。这种情感在近些年的知青网站中更为明显。但是知青在追忆青春时不能没有自省和反思,因为他们的青春处在一个疯狂、荒唐的非常年代。已有不少知青对这种“无悔”式的追忆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如知青作家张抗抗说:“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是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么?”^②

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民间书写的最大价值在于其提供了浩瀚丰富的关于知青时代的独特而珍贵的史料。知青历史的书写要关注高层决策、政策演变、国家权力的强力推进,也要关注知青在农村的生存实态和生命经历。这不仅是顺应眼光向下的社会史取向,也因为知青历史的主体就是千百万知青。政府文件、档案资料、报刊文章等是研究者通常使用的基本史料,但民间书写中有大量知青在农村生存实态的鲜活素材,这是前一类资料所无法提供的。即使一些老知青们缺少自省和反思的青春追忆,也是知青一代生命经历的真实反映,为后人书写知青历史提供了无法替代的史料。

以定宜庄、刘小萌撰写的两部《中国知青史》为标志的史学书写的第一波高潮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其间虽有一些知青历史研究的成果问世,总体上却进展缓慢。这主要是因为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工作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因此在整体上拖了研究的后腿。

二

关于知青史料,迄今已经整理并出版的只有寥寥数种。因此当务之急是做好史料整理工作,为对知青历史的深入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

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史料,大致可分为各级政府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档案文件、地方志与统计年鉴等官方出版物、各种报章杂志、知青回忆录以及知青当年的日记书信等几大门类。其中档案文件的史料价值当然最高,最能反映从政府决策、政策执行到知青安置及知青在农村生活生产的各种情况,但这些档案大都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有些甚至还未编目,且各级档案馆开放程度不一,研究者要对其全面利用目前尚有很大的难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各级政府组织编纂并汇集了许多官方资料和数据的地方志对于知青研究而言就有其

① 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第 138 页。这本书中的老三届讲述者大多数是在文化教育单位工作的老知青。

② 张抗抗:《张抗抗知青作品选》“自序”,西苑出版社 2000 年版。

特殊而重要的价值了。

地方志的编纂在中国源远流长。“文革”结束后,一度中断的修志传统得到恢复。1977年起修志工作在少数县市率先开始,随即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至80年代修志工作已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各地相继成立了省、地(市)、县各级修志机构。到2001年,全国规划的省市(地)县三级志书6319部中已完成并出版的有4789部,超过了75%。到2005年,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宣告基本完成,完成规划志书的86.36%,其中省、市、县三级方志完成率分别为81.4%、77.3%、91%。^①这数千部新编地方志是知青研究的史料宝藏。

资料性是方志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新方志的编纂过程中,各地都注重资料的搜集,尤其是1949年后资料的搜集都以政府档案为基础,因此,新方志中保存了大量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在内的珍贵的当代史资料。新编方志以省、地(市)、县三级政府为编写主体,同时在省、地(市)一级还编有专业志,如劳动志、青年志等。有关知青的史料最多出现在省、地一级志书的劳动志中,一般都有“知青上山下乡”的专编或专章,记录所属地区上山下乡的基本概况,其资料来源均为政府的档案文件。这部分资料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并在研究中予以使用。而劳动志之外的其他专业志中也包含有许多有价值的知青资料,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和关注。如铁路运输志、航运志中,就有运载知青奔赴边疆农村的次数、人数等统计;轻工业志、商业志中,就有按政策供应知青下乡用品的条款;教育志、出版志中,就有为知青举办函授教育、编辑知青读物的材料;司法志(或法院志、审判志、公安志)中就有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中刑事案件的信息,而这类档案在各地档案馆中许多都未能开放,因而更突显其史料价值。

迄今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学研究,大都还是在全国的层面上展开。但知青上山下乡涉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各地显示出很大的差异性。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输出地区,而黑龙江、陕西、内蒙、云南等地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接受地区。同为接受地区,上述各省区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还有更多的省份如江苏省、广东省等,知青就主要在本省范围内下放和安置,这就使知青在各地的上山下乡带有各自的特点。就以我们接触的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的老知青为例,同样去农村插队,在黑龙江边的一天可挣工分2元多,而在皖北的一天工分所得只有1角钱,两者相差在20倍以上。因此要进一步推进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学研究,必须深入到省乃至县的层面,认真梳理各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事实,既要展现这一运动在全国层面的共性,更要揭示它在各地的特殊性,从而全面地反映这场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运动。就此而言,新编地方志有其特殊而重要的价值。通过这些方志,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省、地、县三级政府对上山下乡政策的具体执行及各地执行中的差异,看到知识青年在各地不同的生存状态以

^① 巴兆祥:《中国大陆新方志编纂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载台湾文献馆:《方志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文献馆2008年9月;田嘉:《在全国第二轮修志试点单位方志理论与编纂研修班上的讲话》,载《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7期。

及与当地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而在对全国各地深入到县层面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就有可能整合出全国范围内更为全面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图景。

当然,最终完成的新编地方志存在着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这是因为各地新方志的编纂人员来自不同的背景,以前从事不同的工作,对方志编纂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就知青上山下乡而言,各地的新方志就出现了内容详略不一甚至缺漏的情况。在省志方面,因为有劳动志这样的专业志,所以知青上山下乡的内容一般不会缺漏。但内蒙古自治区除在劳动志中对知青上山下乡有记载外,还编有五十余万字的《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①,以大事记的方式记载了从20世纪50年代起知青上山下乡在该区的历史进程。这是我们所见仅有的知青专志。在县志方面,记载知青的内容详略间的差异就很大了,有的列有专章,叙述达上万字之多,细列知青下乡人数、安置经费、劳动生活、入党入团、返城状况等,有的只在大事记中寥寥数句带过,也有的甚至不着一字。当然,内容的详略在一定程度上与各地接受和安置知青的情况有关,但也确实有遗漏记载的事例。如河南《兰考县志》没有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记载,而据我们所知,至少有20多名红卫兵在“文革”期间从上海志愿到兰考县插队落户。因此,新编地方志尽管是有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史料宝藏,但仍有其先天不足之处。

全国新编省、地(市)、县三级方志有6000余部,卷帙浩繁,数量庞大。就研究者个人而言,很难大范围地从这些方志中寻找与知青上山下乡有关的资料。这也是为什么迄今只有个别研究知青史的学者利用过部分省级方志主要是其中的劳动志进行研究,而大量方志中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史料还未能得到研究者利用的原因。此外,方志尤其是县志不像一般图书,流通范围有限,许多图书馆收藏不全,这也给查阅带来了不便。

有鉴于此,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从2010年起酝酿启动对全国新编方志中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资料进行辑录,希望以竭泽而渔、一网打尽的方式将这些资料汇编成《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以基础史料的建设来推进知青史的研究。这项工作从2011年11月下旬正式开始进行,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动员了50多名老知青和一些年轻人作为志愿者,从6000余部方志中去查阅、复制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资料。几十名老知青在上海通志馆和上海图书馆查阅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奠定了史料辑录这一浩大工程的基础。此后,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又请一些北京老知青在国家图书馆补充查阅上海两馆缺漏的新方志。因此,没有这些老知青们的努力和付出就无法编出目前这套六卷本的资料集。

三

我们动议汇编这样一套大规模的知青史料,是因为我们相信这必将能推进知青史的研究,拓宽和深化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在从新编地方志中辑录相关史料并对之

^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进行编辑的过程中,我们随机挑选了一些省份的方志,进行了初步的阅读,更坚定了我们的这一信念。以下我们从安置经费、动员政策、知青婚姻和与知青有关的案件等几个方面来看地方志中知青史料的价值,并通过这些史料来进一步讨论“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相关问题。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安置经费。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记载道:“1962—1979年,中央财政下拨的知青经费达75亿元之多,地方财政以及企、事业单位花的钱大体与中央财政下拨经费持平,合计不下150亿元。”^①这部书使用的材料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档案,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但该书所述知青安置经费是全国层面的,并没列出各省经费使用的具体情况。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中有专门的章节叙述知青安置经费,也没有涉及各省的经费数据。而各省、地(市)、县的方志,尤其是专业志如劳动志、财政志中就有这方面的详尽资料,这就使我们可以从省乃至县的层面上了解知青安置经费在各地实际使用的具体情况。例如,黑龙江省1968年至1979年间获得中央财政下拨上山下乡经费78766万元,实际支出113441万元(《黑龙江省志·劳动志》,本书第1006页)。广东省1973年至1981年间国家下拨知青安置经费53299万元,实际支出39521万元(《广东省志·劳动志》,见本书中南卷,第3807页)。陕西省1962年至1979年间国家拨付知青安置经费19738.9万元,实际支出17556.7万元(《陕西省志·劳动志》,见本书西北卷,第1396页)。广西壮族自治区1962年至1979年间中央下拨知青安置款16888.8万元,实际支出14872.2万元(《广西通志·劳动志》,见本书中南卷,第3998页)。在上述四省中,只有黑龙江省的实际支出超出了国家的下拨经费,而其他各省都未使用完国家拨款。这一情况反映了全国的一般状况,据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62年至1979年间国家拨付知青经费达754297.1万元,实际使用额是657896.7万元。^②而黑龙江省作为安置知青人数居全国第二、接受外省市知青最多的省份,且又地处边疆高寒地区,因此实际使用经费超出国家下拨的额度是可以理解的。

就知青安置经费的人均使用情况而言,各省间显示出较大的差异。黑龙江省1968年至1979年间知青安置经费人均使用约613元。安徽省1967年至1979年间知青安置经费人均使用约396元(《安徽省志·财政志》,见本书华东卷,第2817页)。浙江省1968年至1979年间知青安置经费人均使用约278元(《浙江省劳动保障志》,见本书华东卷,辑录第2681、2677页)。北京市1968年至1980年间在郊区安置知青37万人,人均安置经费约486元(《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见本书华北卷,第25页)。而在1962年至1979年间,陕西省和广西自治区的知青安置经费人均使用分别是426元与388元。这些数据显示出北方省份人均经费使用普遍高于南方省份,这是与中央政策规定相一致的,但黑龙

①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② 同上书,第264页。

江省的人均安置经费超出国家 1973 年规定的北方各省每人 500 元的标准一大截(还没考虑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人均经费 400 元的因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南方省份间在人均安置经费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如浙江省的人均经费是 279 元,而广西则是 388 元(广西还是 1962 年算起的平均数,而“文革”前的安置费要低于“文革”期间)。这种差异反映了什么问题,是各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原因,还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这是需要做进一步研究的。

省区间的差异不仅出现在人均经费上,还出现在安置经费的具体使用上。1973 年,中央提高知青安置补助标准,规定城镇知青回乡、插队和到集体所有制场队的,南方各省每人补助 480 元,北方各省每人补助 500 元;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场的每人补助 400 元。但各省对安置费的实际使用有不同的规定。以安置费中占比例最大的建房补助而言,广东是 250 元,山东是 230 元,湖南是 220 元,北京、浙江和福建都是 200 元。生活补助的差异就更大,北京、福建是 200 元,山东、浙江是 170 元,湖南是 140 元,广东是 100 元。而这些生活补助费具体如何发放各地更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仅省区间在使用知青安置经费方面显现出很大的差异,即使在一个省区内,各县间的经费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多数县实际使用的知青安置经费按人均计算在 200 多元,如苍梧县的 231 元,钦州县的 242 元,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 246 元,但武鸣县却高达 444 元。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福建省,该省多数县实际使用的知青安置经费按人均计算在 300 多元,如连江县和大田县的 338 元,上杭县的 353 元,建瓯县的 367 元,但高的如长汀县却达到 531 元,而低的如清流县是 251 元,政和县是 217 元,永定县则只有 158 元(以上数据均根据各县县志统计)。各县之间的差异与省区之间的差异一样也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而对其原因的探究和剖析,必将丰富我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

与知青安置经费相关的是知青输出城市对知青接收地区的物资支持。《上海青年志》记载,1968 年至 1973 年上海市对接收上海知青的省、区提供价值 1 600 多万元的物资。到 1975 年,上海市给在各地知青提供大小拖拉机 7 000 余台、拖斗 800 余只、各类汽车 50 余辆,以及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水泵和各种建筑材料等物资,价值 5 500 万元,还提供无息贷款 500 万元,最后全部免于归还。(见本书华东卷,第 2220 页)这一情况在接收地的方志中也有反映。《巢湖市志》记载,在接收上海知青期间,上海支援巢县无息贷款 4.7 万元,先后拨给 3 批支援物质,有缝纫机、拖拉机、变压器、柴油机等,帮助社队增加收入,减轻安置负担。(见本书华东卷,第 2885 页)知青输出地对知青接收地的支持,是知青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这也是研究“文革”期间城乡经济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方志中的相关资料理应得到关注。

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员政策。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号召后,全国兴起了动员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高潮。高潮之初各地大都采取了“一片红”、“一刀切”的做法,随后一些地方相继有政策出台,规定了可以不动员下乡的范围。但

各地的政策在出台的时间和规定的范围上又有不同。

根据对方志资料不全面的初步的查阅,安徽省铜陵市最早出台相关政策。该市在1969年即还在毛泽东指示发出后的动员高潮中,就明确规定了可不动员下乡的中学毕业生的范围,涉及病残和家庭困难两个方面。病残方面为身体残废或不易治疗的疾病如驼背、跛腿、癫痫、心脏病、高血压、脑震荡等,严重慢性病和传染病可暂缓下乡,治愈后继续动员。家庭困难方面为父母双方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或上有老(祖父母年迈)下有幼(弟妹年幼),家中又无经济来源的,可不动员;与上述情况相同但有经济来源的,可暂缓下乡(《铜陵市劳动志》,见本书华东卷,第2852页)。可不动员和暂缓动员的范围列得非常具体。

1972年,一些省份或城市也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广东省在该年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通知中明确,除根据国家规定和计划,继续升学、患严重疾病或残疾者,独生子女、多子女家庭身边只有一个子女及家庭有特殊困难的不作为动员上山下乡对象外,其余都动员上山下乡(《广东省志·劳动志》,见本书中南卷,第3803页)。同年,吉林省明确提出“五种人”可不动员上山下乡:独生子女;本人患有严重疾病难以治愈,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家庭有特殊困难的(父母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无人照顾的;父母双亡,遗留下来的弟妹无人照顾的);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华侨子女(《吉林省志·劳动志》,见本书东北卷,第825页)。广东省虽无“五种人”的概念,但实际上可不动员上山下乡的对象也是“五种”。两省间的不同在于广东的第一类“根据国家规定和计划继续升学”和吉林的第五类“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和华侨子女”,其余四类则基本相同。同年哈尔滨市也有“五种人”不下乡的明确规定,具体为:烈士子女;多子女下乡,身边只留一个子女的;独生子女;身体严重病残的;是家中唯一劳动力的,有特殊困难离不开的(《哈尔滨市志·劳动、人事、档案》,见本书辑录东北卷,第1033页)。与吉林的不同是将“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和华侨子女”换成了“烈士子女”,并且列在首位。北京市也在同年出台了相关政策,只是对象不是中学毕业生,而是已下乡的知青。市劳动局规定:一、知青父母年迈多病,或患严重慢性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而北京又无亲人照顾的,可允许一人回京落户;二、知青下乡后父母死亡,弟妹年幼需照顾的,可允许一人回京;三、在郊区插队落户的居民,其子女在外地插队,家中没有劳动力造成生活困难的,可允许子女一人随父母落户;四、下乡青年因工致残,要求转回北京落户的,应由接受地妥善安置,对于本人生活不能自理家长坚决要求回京的,可以回京(《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志·劳动志》,见本书华北卷,第23页)。地方出台的这些政策表明,在“一刀切”的大规模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后,出现了一些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因此有些地方的政府率先制定了相关政策。

到知青政策大规模调整的1973年,中央也注意到这些问题,于是在8月颁发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中规定:“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下乡”,以后又增加了家庭有特殊困难的,这样就明确了不动员下乡的五种人。该中央文件还规定“归侨学生下乡的,主要安